

中共的經濟改革與蘇聯的新經濟政策

——一個不完全相稱的對比

尹慶耀

這裏所說的新經濟政策 (Novaya Economicheskaya Politika)，是一九二一至二五年列寧為了挽救當時瀕臨崩潰的蘇聯經濟，所實施的一項戰略退却。中共當前的經濟改革，動機在把中共經濟從死亡邊緣拉回，也具有戰略或戰術退却的意味。

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 認為當年的新經濟政策，並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和平共處，而是按照「誰戰勝誰」的原則進行的殘酷的階級鬭爭^①。新經濟政策結束 (列寧已死) 後，新經濟政策人 (N. E. P. Men，指新經濟政策時，利用機會使自己的私有工商業獲利的人) 處處遭受歧視。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們的財產都被沒收，多數人被送進集中營。三十年代大整肅時期，常有人因係新經濟政策人的親戚而被判罪刑。中共的經濟改革，也不會承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和平共處。一旦政策改變，現今農村裏的萬元戶、經營個體經濟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將被送往那裏，目前還不得而知。不過已有人就心將來會被中共割「資本主義尾巴」，那並非杞人憂天。

綜上所述，可知中共的經濟改革與蘇聯的新經濟政策，某些精神是相通的。但由於時代背景不同，條件與作法各異，二者並非完全相同。

以下且讓我們談談蘇聯實施新經濟政策的背景及這個政策的主要內容。

註① 參閱羅森塔爾 (M. Rozenant)、尤金 (P. Yudin) 合編、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簡明哲學辭典」(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七月)「新經濟政策」條註釋，四五〇—四五一頁。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俄曆三日），列寧從流亡地返回俄國，他於十七日在彼得格勒塔夫利達宮召開的兩次會議（布爾什維克會議和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Mensheviks）代表的聯席會議）作了「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的報告，就是有名的「四月提綱」。這個提綱中關於經濟問題，有下列的文字：

「6. 在土地綱領上，應把重心移到雇農代表蘇維埃。
「沒收一切地主土地。」

「國內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由當地雇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把每個大莊園（其面積約一〇〇俄畝至三〇〇俄畝，根據當地條件和其他條件並由地方機關決定）建成模範農場，由雇農代表進行監督，由公家出資經營。」

「7. 立刻把全國所有銀行併成一個國家銀行，由工人代表蘇維埃進行監督。」

「8. 我們的直接任務並不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只是立刻過渡到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社會的產品生產和分配」②。
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從一九一七年底至一九一八年，是列寧所稱的「赤衛隊進攻資本的時期」。其方式是以暴力奪取政權，掌握國民經濟最高統治權——將土地、銀行、鐵路、大工業、外貿都收歸國有，在農村創立貧民委員會，並鎮壓富農。

十月革命成功後的翌日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俄曆十月廿六日），蘇維埃政權發布「關於土地的布告」，無償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國有化。廿七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最高蘇維埃前身）通過「勞動者管理企業命令」，着手使工人統制生產與分配，資本人抵抗者即遭工人驅逐。十二月十五日，為達成國民經濟與國家財政組織化任務，成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負責統制經濟機構、統一工廠委員會的活動及推行國有化。同月廿七日，將公司化的銀行國有化，個人銀行業務則置於國立銀行理事會的管理之下。一九一八年二月五日發布商船隊國有化命令，四月廿二日發布對外貿易國有化命令。這些都符合「四月提綱」的精神，執行上也還相當穩健，沒收的企業大多限於違反「勞動者管理企業命令」者，截至一九一八年六月一日止，全國經沒收而國有化的企業，僅有五二一家。

由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初，蘇維埃政權的社會和經濟政策，被稱為戰時共產主義。那時政策之趨於過激，是由於下述幾項觀念與因素所致。第一，是共產黨人的社會主義經濟觀，他們把全體國民經濟看作一大工廠，而各個企業是它的車間或工作現

註② 列寧：「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列寧全集）第廿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三〇四頁。

場，依此觀念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權的命令經濟體系；第二，是無產階級執政觀，認為在過渡時期^③不僅要對資產階級施行強制，也有必要對部分勞動者加以強制；第三，戰時共產主義，是直接走向社會主義的實踐之產物；第四，它同時是戰時統制經濟架構的結果^④。

馬克思和恩格斯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競爭，是一種無政府生產狀態，會造成經濟恐慌與資本本集中等等，使社會向貧富兩極分化，而釀成革命危機。他們主張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由社會管理取代個人管理，以聯合取代競爭，使整個社會實施有計劃的、自覺的生產。這是共黨國家實施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根據。

如前所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蘇聯成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廢止）、縣等設立國民經濟委員會，其任務即在全體國民經濟及國家財政組織化，並查封、沒收私營企業。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下設各部及協調各部的局，隨同國有化的進展，以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取代部課為部門別工業管理機構，如一九一八年二月有中央製茶委員會、中央肥皂委員會，四月有泥炭總委員會、中央纖維委員會，五月有中央樹膠委員會、石油總委員會之設，負責管理國有企業、限制私營企業、準備國有化等工作。除了對所屬企業一般性的調整任務之外，對其原料供應、產品運銷等繁瑣的業務活動，也作直接的統制。

隨同機構的完備，國有化企業範圍也在擴大。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砂糖工業國有化，六月廿日石油產業國有化，同月廿八日終於將佔全部工業企業總資本額四分之三即三〇億盧布的一、一〇〇家企業國有化。到內戰即將終了的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廿九日，連小企業也國有化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將私營鐵路國有化，十一月禁止私人商業。十二月對十六歲以上五十歲未滿的全體人民課以勞動義務。一九二〇年一月，作為戰時措施，實施嚴格的半軍事性的勞動紀律，擅離職場者科以重罰。

最值得提出的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糧食政策。一九一八年五月九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命令，農民除保留其全家一年份口糧及翌年所需的種子外，所有餘糧均照極低的公定價格繳售給國家，違反命令者以人民的敵人論罪，科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沒收其財產，這就是所謂餘糧徵集制。所徵收的糧食，由各管理機構負責配給，工業企業方面由國民經濟委員會負責；居民的配給，由糧食人民委員部負責；戰爭有關機構及軍隊的配給，則由工農國民會議及軍事配給機構負責。

當時俄國糧食情況非常惡劣，富農拒按公定價格繳售糧食，而從事投機買賣或釀酒，並進行抗暴活動。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乃

註③ 依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的政治形態。參閱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共產黨原始資料選輯〕第一集（臺北：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輯印，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八七頁。

註④ 參閱森章編著：「社會主義企業論」（東京：日本評論社，一九七七年四月廿日），二七頁。

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決定在全國成立貧民委員會，其任務為協助徵糧隊繳收富農餘糧（必要時沒收中農、富農及反布爾什維克份子之財產），分配糧食、必需品及其他日用品，供應工業中心及紅軍糧食。貧民委員會確曾發生極大作用，但其行動過激，甚且與地方蘇維埃發生對立，經全俄第六次臨時蘇維埃大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決議解散，併入地方蘇維埃。

二

蘇維埃政權初期，由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政治觀念的影響，若干共產黨人急於社會主義化，並為共產主義社會奠定基礎，有些人認為廢止貨幣，由國家採行有組織的以貨易貨、實物支付制度，就可塑造共產主義社會的雛型。如托派經濟學家蒲列奧布拉增斯基（E. N. Preobrazhensky）主張無限制發行貨幣，使其實質上毫無價值，即可促進無貨幣、無商業之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一九二〇年刊行的布哈林（N. I. Bukharin）著「過渡時期的經濟學」一書，開宗明義就說：「理論經濟學是立足於商品生產的社會經濟基礎上的科學，即關於非組織性的社會經濟之科學。那是在生產與分配都還是無政府狀態、社會生活的規律性並不存在，而採取不依存於個人或社會意志的『原始的自然法則』的形式，也就是和所謂『屋頂從人的頭頂上倒下來』的重力法則『相同的』盲目的』必然性的社會裏的科學」。可是，「當我們考量到組織化的社會結構時，價值、價格、利潤等等經濟學上所有的根本『問題』就一一消滅。在此等場合，『人與人的關係』就不再以『物與物的關係』來表現，社會經濟不再受市場的盲目力量或競爭的制約，而是為有意識實施的計劃所規範。……由於市場並不存在，研究市場『盲目法則』的科學也就沒有了存在的餘地。因此，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消滅的同時，經濟學也跟著消滅了」^⑤。

在右述思想影響下，蘇維埃政權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布告，規定企業間的清算，不以貨幣而以實物計算。不論城市或鄉村，人民須向國家機關或合作社登記，以領取配給物資。同年十一月禁止私人商業。到一九二〇年，勞動者工資中實物佔九三%。同年一月十九日的法令，廢止貨幣制度，創設無貨幣的清算制度，關閉人民銀行，將其資產與負債移交財務人民委員部內的中央預算、會計部接管。十月十一日公布法令，郵政、電信、電話、自來水等公共服務業全部免費，燃料費、房租也予免除，食物、日用品也免費配給。這些措施，並未將經濟形態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却是招來混亂，妨害了經濟的正常發展。

國有化後的工業，由於戰時工廠紀錄散失；技術及生產指標、財產目錄等新作困難。再加上指導思想的荒誕謬誤；企業家逃亡或被驅逐；勞動者出身的管理人員經驗與訓練不足，對原有專家又不信任；管理機構高度集權，命令不切實際，指揮採劃一主

註⑤ 轉自副島種典編著：「蘇維埃經濟的歷史與理論」（東京：日本評論社，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一版第二次印刷），二五—二六頁。

義，缺乏效率……遂爲原已困難的經濟製造許多新的困難。

農業方面的餘糧徵集制本已不合理，又因通貨膨脹、貨幣貶值，農民的糧食幾等於無償徵發。農民的生產情緒被扼殺，有些更宰殺役畜，連翌年的種子也吃光，糧食徵集隊時遭農民襲擊，並造成一九二一年的饑荒。

一九二〇年工人的實際工資，僅當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三四·一，莫斯科工人月入，僅夠一天至一二天的食用。於是工人也起而反共。

一九一九年至二二年，唐波夫省在安東諾夫領導下，爆發反共農民運動，史稱安東諾夫運動（Antonov Uprising），直到新經濟政策實施後，才真正救平。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克琅斯塔得（Kronstadt）水兵叛變，反抗共黨獨裁。這些都是戰時共產主義的後果，也是新經濟政策的催生劑。

三

俄國赤色政權下的內戰，到一九二〇年大致結束，但經濟則瀕臨崩潰邊緣。當時列寧曾經指出，要麼讓中農獲得滿足的經濟狀況，承認商品可以自由交易；要麼由於世界革命進展緩慢，聽任無產階級政權無法維持。布爾什維克必須二者擇一^⑥。爲了挽救共黨政權的命運，布爾什維克採取了退却、讓步這條路。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俄共（布）第十次大會，決定採行新經濟政策。那是在共黨政權掌握國民經濟的重要據點即所謂管制高地的條件下，允許商業方面復活資本主義，提高勞動者及農民的生產情緒，使其能發揮創意，俾在國民經濟方面能振衰起弊。另一方面，使佔俄國國民經濟支配地位的小商品生產者與農民結合，恢復小農業與國營工業的商品交換，建立勞動者與農民的經濟統合以取代過去的軍事、政治的結合，在和平的經濟活動中，逐漸排除資本主義因素，擴大社會主義因素的作用，最終使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⑦。

馬克思曾不斷抨擊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甚至斥之爲商品拜物教。新經濟政策允許復活資本主義商業，自然是一項退却。當時在俄國，商品交易自由，意味著零售商業的再建。那是使提供糧食和工業原料的農民經濟，與工礦業勞動者和交通業勞動者相

註⑥ 轉自勞帕赫（Hans Raupach）原著玉野井芳監譯：《蘇聯經濟史》（東京：學陽書房，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五日），四八頁。

註⑦ 《蘇維埃經濟的歷史與理論》，三二頁。

結合的唯一途徑。由於列寧終於體認到，在幾百萬小生產者還存在的場合，完全禁止商品交易，是黨的愚蠢的自殺行爲^⑥。這句話的反面意義，就是商品交易的自由，乃當時俄國國民經濟之所必需。

根據共黨第十次大會的決定，蘇維埃政權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廿一日廢除作爲戰時共產主義骨幹的餘糧徵集制，改以實物徵收糧食稅。在春季播種前，確定稅率及繳納期。稅率照估定產量約徵一〇%，以實物繳稅（後又改爲貨幣），納稅後農民所餘糧食可自由處分。此一糧食稅制，使小農獲得經濟滿足，復活了自由市場。它乃是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環節。

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准許人民申請設立雇工在廿人以下的製造業。同年十月廿七日，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部長會議前身）發布「脫離國家給與企業」生產品之自由處分令，規定脫離國家供給的企業，爲了支付工資、薪水、入手原料及其他開支，可根據市場價格出售其產品。同時將一、八〇〇以上的小企業委託個人或合作社經營。十二月十日的布告，將十人以下的企業統歸民營。與此同時，又採取了自由工資契約方式，按勞動生產率區分工資等級，以取代過去的均一工資制。

一九二〇年一月，列強解除了對蘇維埃政權的經濟封鎖。同年十一月廿三日，克宮命令規定，爲吸收外國資本參加當時蘇維埃國家還不能發展的地區和工業部門的開發，准許與外國締結租讓條約。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蘇聯與英國簽署貿易協定，繼又與挪、奧、義、德締結類似協定。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蘇德拉帕羅條約（Treaty of Rapallo）成立，雙方取消賠款，恢復外交關係，在相互貿易中享受特別優待。蘇聯亟願藉西方的力量，協助它的社會主義建設。但租讓企業雖屬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仍係在蘇維埃政權規定的條件下活動，並接受職工會的監督，且規模極小，在過渡時期經濟中處於從屬地位，所起作用不大。

新經濟政策時期是一種混合經濟，共黨自稱當時經濟有五種成分：（一）家長制的經濟（大部分係個體農民成分）；（二）小商品生產成分；（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四）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主要是租讓制）；（五）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乃當時還很弱的社會主義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極小地位的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莊，國營貿易和合作社）。

四

由於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共黨就面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計劃與市場的問題、集權與分權的問題等等

註⑥ 《蘇聯經濟史》，四八頁。

新經濟政策原本是一項先退却然後轉為反攻的策略，儘管有若干讓步措施，但土地礦山、大工業工廠、運輸、大銀行和對外貿易，仍操在國家手中，那就使社會主義因素掌握到勝利的關鍵。

其實早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廿七日，列寧就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宣稱退却「已經夠了」，「甚至可以說已經終結了」，開始下達了攻擊令^⑩。

本來，照馬克思的構想，在公有財產制下，共同使用生產工具，協議分配產品，本來就沒有市場存在的餘地。如前所述，布哈林之抨擊市場的「盲目法則」，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之禁止商業活動，都可說是其來有自。然而，新經濟政策的核心內容，正是復活市場經濟。如何利用市場機能而又加以制御，使它為經濟復興與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就是蘇維埃政權的重要課題。

列寧曾承認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廢止商業是有害的。他提到「我們曾經以為建立了國家生產和國家分配制度以後，我們就可以直接進入一個與以前不同的生產和分配的經濟制度。我們曾經以為，兩種制度——國家生產和分配制度同私人商業生產和分配制度將互相進行鬭爭，並且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鬭爭：我們將逐步奪取敵對制度的生產和分配而建立起國家的生產和分配」。但是當時根本沒有提出我們的經濟同市場、同商業有何種關係的問題^⑪。列寧曾作了如此反省，但他又表明新經濟政策不是改變單一的國民經濟計劃制度，而是改變方法，以便它更容易實現。那是在計劃經濟中，引進市場因素的一項構想^⑫。

在市場復活的條件下，國有企業的經營方式，也不得不加以改變。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九日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作「論新經濟政策」的報告中，就指出「目前少數企業已經實行獨立會計制度，按自由市場的價格支付工資，改用黃金結帳」^⑬。一九二二年一月他在「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一文中，又提到「已經社會化的國營企業也在改用所謂經濟核算制，即商業原則」^⑭。

經濟核算制大多譯為獨立核算制，是指各個國營企業自為一收支單位，其會計與國家預算分離。各企業具有法人資格，成為買賣和簽訂契約的主體，藉收入的增加與支出的削減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因而就有必要承認它的自主權，那是包括利用物質刺激、

註⑩ 列寧：「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列寧文選》兩卷本第二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九四六—九七三頁。

註⑪ 「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六六頁。

註⑫ 參閱「社會主義企業論」，三四頁。

註⑬ 「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前揭書，八三頁。

註⑭ 「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一五五頁。

依靠企業自主活動以提高效率的制度。

另一項值得提起的是工業管理機構的演變和計劃化的進展。共黨的計劃經濟原本是一種中央集權制度，那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謂有計劃的自覺的生產的構想，也就是中共所謂「全國一盤棋」，但執行結果却與理想相去甚遠，而且是在蘇維埃政權初期就已經發現。一九二〇年底，蘇聯透過產業部門別的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見前）將全國企業、大小規模的所有工業都置於中央集權的指導之下，結果發現那只是紙上空談，對於全部企業資金的供給及企業活動的統制根本不可能。於是，在蘇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反覆的集權與分權問題，就開始登場。一九二二年十月廿七日的布告，就把那些產別委員會由五二個裁併為一六個。一九二二年二月，中央直接控制的範圍，就僅以其製品主要係繳納給國家的企業為限。國營企業都實行商業核算，同時（三月間）採企業首長責任制（Einmannführung）。過去的企業管理方式，是由代表工會的工廠委員會、企業首長及共黨細胞等三頭馬車採合議制管理，由於事權分散、責任不明，阻礙業務的推行，才改採單獨責任制，但當時此一制度也未能充分發揮其機能。同年十二月，爲了提高勞動意欲，產生新的勞動紀律，對官僚主義的管理方式加以清算，提出一項新的方針，即建立可使勞動者自主的參加生產的管理形態。爲此，與加強單獨責任制同時，也須對企業直接管理業務給予大幅度的自主權。但在當時，指導的中央集權化和管理的地方分權化原則，仍僅止於原則而已。而一長制的正式確立，乃是一九二九年史達林時代的事。

新經濟政策原本是一項戰略退却。列寧說：「退却是爲了將來最終地轉爲進攻」^⑭。又說：「用所謂『新的迂迴方法』來奪取一些陣地，實行退却，以便更有準備地轉入對資本主義的進攻」^⑮。這些話，是列寧解釋新經濟政策時說的。經過新經濟政策階段，由於社會主義成分在工業、農業和商業等領域中的統治地位逐漸鞏固，蘇維埃政權乃於一九二八年宣告新經濟政策結束，進入「一國社會主義」的強行工業化時期。

五

中共在大躍進期間，經濟損失二、〇〇〇億元（「人民幣」——下同），工業生產下降七〇%；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損失五、〇〇〇億元。據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中報告，在「四人幫」時期，單止一九七四至七六年，工業產值即損失一、〇〇〇億元，鋼產量減少二、八〇〇萬噸，財政收入損失四〇〇億元，使國民經濟瀕臨破產邊緣。然而，就在如此的基礎上，華國鋒却又

註⑭ 「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前揭書，七三頁。

註⑮ 「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前揭書，一五五頁。

重提「四化」構想，並制定「躍進式」的十年經濟規劃，結果又造成「兩年失誤」。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決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開始進入經濟改革期，但以調整爲重。

一九八一年初，「人民日報」刊有「談退却」一文，其中說：「在戰爭中，『退却』和『進攻』一樣，是常有的事。……正確的退却，往往成爲勝利進攻的前提」（當年列寧談論新經濟政策，也常以戰爭中的退却爲例——筆者）。「二十年代蘇維埃俄國由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就是一種正確的退却。這種退却，糾正了向共產主義冒進的錯誤的政策，實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鞏固工農聯盟的方針和措施，從而爲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這次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面的後退，也是一種主動的有組織的退却。我們講『退』，主要是指基本建設投資要減少，各項開支要壓縮，超過能源和原材料供應可能的加工工業要控制，過高的生產指標要降下來。目的是要穩定經濟，消滅赤字，使財政收支達到平衡，並進而從根本上解決我們的經濟長期存在的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我們的『退却』，是有退有進，以退保進，以退促進」^⑩。由此可知，中共當前的調整改革，也同當年蘇聯的新經濟政策一樣，是戰略退却，目的在糾正左傾冒進的作風，穩住垂危的經濟，然後轉爲進攻，其目標仍然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中共的經濟改革，千頭萬緒，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納。茲根據中共改革派經濟學家、「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劉國光（候補中委）的一篇文章，要約其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如左：

（一）集權與分權問題 那就是如何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過度集中的經濟決策權力適度下放的問題。那包括：（1）中央和地方的權限劃分，如所謂「劃分收支、分灶吃飯」等；（2）國家和企業間的權限劃分，如所謂利潤留成和各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等；（3）企業內部的民主化問題，如勞動者個人在參加民主管理、選擇職業和購買消費品方面有多大的自主權等。

（二）計劃與市場問題 那是如何在原來的計劃經濟架構內，引進市場機能的問題。如對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的重要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指令性計劃；對一般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實行指導性計劃；對品種繁多的日用百貨、小商品和其他農副產品實行市場調節下的自由生產和銷售等。這裏還包括有限度利用價值規律的問題。指令性計劃是強制性約束性達成計劃指標；指導性計劃是自覺地運用與價值規律有關的經濟槓桿引導企業實現國家計劃的要求，這裏實際上是運用了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它不同於自由市場的調節，在於後者是由價格和供求關係的自發變化進行調節，而在指導性計劃的場合，則是國家自覺利用價格和其他市場參數的變動來調節。所以價值規律的運用是有限度的。而總的說來，中共仍堅持「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一九八二年一月陳雲所講）。

註⑩ 崔佩亭、王兆錚：「談退却」，「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九日）第五版。

(三)行政管理與經濟管理問題 中共過去傳統的體制，是過多地用行政組織和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而很少用經濟組織和經濟手段來管理經濟。自從胡喬木發表「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文章以後，才比較注意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但那不是不再要行政管理，而是要求在社會主義經濟管理中，行政辦法要以客觀經濟規律為依據，正確反映和處理各方面的利益關係^①。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中共「國務院」公佈「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共有十條，其要點是：

(一)允許企業在確保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可自行安排生產產品。

(二)在產品銷售方面，除國家特殊規定不准自銷者外，以下產品都可以自銷：企業分成的產品、計劃外超產的產品、試製的新產品、庫存積壓的產品、商業部門不收購的產品。

(三)在產品價格方面，允許在國家規定價格的二〇%上下限內浮動。

(四)在物資選購方面，企業可和供貨單位簽訂合同，直接結算，直達供應。

(五)企業有權把多餘、閒置的固定資產出租和轉售，但所得必須用於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

(六)企業在上級核定的職工編制範圍內，可自行確定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

(七)廠長（經理）、黨委書記由上級任命；廠級行政副職由廠長提名，報主管部門批准；廠內中層行政幹部由廠長任免。企業可自行招聘職工，並自定報酬；有權抵制任何人向企業硬性安插人員。

此外，中共經濟體制，最初是從蘇聯照抄照搬而來。中共政權對於「國營」企業，財務上「統收統支」，盈利全部上繳，虧損銀行補貼。物資上「統配」「統購」「統銷」。人事上幹部、工人由上級統一分配，工資由國家統一規定。因而養成「吃大鍋飯」風氣。目前，除在農村推行「包產」「包乾」的「生產責任制」外，其他部門也推行「任務包乾」、「虧損包乾」、「利潤包乾」等等。一九八三年起，又試行將小型國營企業發包給個人經營。同時試行以利代稅，即向企業徵稅以代替上繳利潤，簡稱「利改稅」。一九八四年五月中旬，趙紫陽在六屆「人大」二次會議中所提「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企業將實行「廠長負責制」，以代替現行的「黨委集體負責制」。

六

註① 劉國光：「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第五版。

蘇維埃政權初期，其農村政策常被「貧民委員會」拖著前進；當前中共的經濟改革特別是農業方面，也常被人民拖著前進。不過，前者是愈拖愈左，後者是愈拖愈右。因而，前者被拖到一個相當程度，是以「右」（「放」）止步；後者被拖到一個相當程度，可能以「左」（「收」）收場。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共黨政權，其新經濟政策是以退却的方式，糾正戰時共產主義的偏差，在史無前例的情況下摸索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共的經濟改革，一則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已有成規可循（中共經濟基本上仍是蘇聯的體制），但因其體制不良又開始摸索（所謂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實係一種摸索）；再則其他共黨國家從六十年代起就有經濟改革的先例，但並無成功的紀錄，中共單獨創出奇蹟實不可能。

蘇聯農業也在實行「包產制」，但莫斯科的經濟改革雖仍廢續進行，其態度則謹慎得多。一九六五年九月柯錫金在蘇共中央全會所提的報告，稱為「關於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計劃工作及加強工業生產經濟刺激」。一九八三年七月蘇共中央與蘇聯部長會議通過的決議案，稱為「有關擴大生產聯合與工業在計劃與經濟活動上的權力及加強它們對勞動成果的責任」。從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起，蘇聯即在五個選定的經濟部門即：重型運輸機械製造部、電工工業部、烏克蘭共和國的食品工業部、白俄羅斯共和國的輕工業部、立陶宛共和國的地方工業部進行經濟實驗。很顯然，蘇聯連「改革」兩個字也避免使用。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比較尺度寬一些，成效也比較好一些。但不像中共那樣大量吸收外資及開辦「經濟特區」。在這方面，中共的膽子大一些，其所冒的風險自然也跟著大了些。換個方式說，六十年代以來共產集團的經濟改革，都是基本上不動搖生產資料公有制及中央計劃制度，只是學習西方的經營管理技術並部分引進市場機能，以挽救其經濟上的沉痾。國家掌握著重要工礦企業、銀行、交通及對外貿易，社會主義經濟佔據關鍵性的重要地位，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體制。但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完全不受資本主義的沖擊。要資本主義的資金、技術，不要自由世界的民主思想，各共黨政權莫不如是，但絕無可能完全如願。假如深圳周圍通了電流的鐵絲網擋不住自由思想的泛濫，那中共的危機就會大過其他共黨政權。

寫到這裏，我們會發現到從有共黨政權到現在，在經濟方面始終面臨著集權與分權問題，中央與地方或者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矛盾問題，計劃與市場問題，行政管理與按經濟規律辦事問題，企業內部黨委集體領導與一長責任制問題，平均主義（人待遇相等）與個別鼓勵問題等等難以解開的死結。歸根結柢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問題，而這個體制的建立，不能單純歸咎於史達林；更基本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那套生產資料公有制、有計劃、自覺的生產和協議分配產品（最終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構想與現實生活無法契合的問題。枝枝節節的技術性改革是不會有功效的。而且，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一方面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是必然會出毛病的。

二十年代蘇聯的新經濟政策，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取代；六十年代共產集團的經濟改革，以一九六八年八月的捷克事件收場

；代表社會主義經濟弊害總暴露的八十年代波蘭團結工聯運動，在戒嚴法下被壓抑；中共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下場將如何？

中共不諱言，它的經濟改革是列寧式的退却，而且改革也有不少相似處。列寧曾經說：「我們是處在還不得不退却的狀態中，退却是爲了在將來最終地轉入進攻」^⑧。如此說來，中共目前退却是不得已，而將來一定要轉爲進攻，假如它不是在退却中陣亡的話！

註⑧ 「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前揭書，七三頁。

東南亞國家國際關係論叢

25開本 全一冊

本書對東南亞國家之國際關係，採分篇論述方式，每篇有其獨特性，惟連貫着眼，亦可窺知此一區域國家對外關係方向及壇變由來之大端。全書三十餘萬字，計四四三頁，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三四三六號帳戶